

◆白城英烈

吕明仁（九）

●胡秀琴

危难莫顾，中流砥柱。

吕明仁受命于危难之时，国民党主力部队的频频进犯，国民党地下党员、特务和土匪不断骚扰，环境相当险恶。

1946年8月中旬，国民党打到郑家屯一带，不断派飞机对通鲁地区进行扫射。同时，派遣特务，策动地方反动地主、土匪、反革命武装对解放区人民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蒙古族的王爷及大牧主，历来握有武装，各霸一方。通辽一带已经投降的地主武装和土匪也借尸还魂，蠢蠢欲动，妄图卷土重来。他们密谋策划了后五道木村农会副会长串通民兵千队副队长等人进行叛乱，抓住了积极为党工作的农会会长窦户和基千队长陈殿相，施尽淫威后将其杀害。

8月底，国民党七十一军新编六师保安三支队由郑家屯、王府、章古台等地分头向通辽、开鲁大举进犯，形势越来越紧张。吕明仁组织进行撤退转移，转移到科左中旗北部的厄玛拉安顿下来，设立了“北山办事处”。

10月底，吕明仁忍着背疮剧痛，带领刚转移出来的地方干部和战士，避开敌人的锋芒，又很快转移到瞻余、高力板一带，进行整顿训练，3天内就组成了武工队。

这时，县委和哲盟地委失去了联系。吕明仁的

组织观念很强，他仍设法向上级请示汇报工作。他认真地向省委写了一份报告，汇报通鲁撤退经过、经验教训及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组织通辽地委机关和有关县的干部战士正在独立进行讨论；并已准备马匹，见机制敌，恢复失地。还说明为迷惑敌人，便于活动，通辽地委机关对外称“长骑兵团”等，请省委给予指示。不久，省报刊登社论，通知各地接受通鲁撤退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吕明仁的行动计划是正确的，给“长骑兵团”干部战士极大鼓舞。在武装游击的日子里，吕明仁时刻注意掌握敌、我、友情况，联系群众，纪律严明。每到一地，他都亲自组织站岗放哨，规定口令联系、集合地点等，以防万一。他还特别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当转移离开驻地时，他都亲自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干部经过的地方打扫得干不干净，水缸里的水挑的满不满，借用老乡的东西还没还，损坏的物品赔没赔。处处体现着热爱人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1947年1月，辽吉省委根据形势的变化，为适应南下反攻的需要，决定将一、五地委合并，称一地委（也称五地委），吕明仁任书记兼军分军区政委。

在长期残酷的战斗实践中，吕明仁善于采取诱敌深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胶东打游击时，他不但练就了一套打仗的过硬本领，而且学会了科学的战略战术。在撤出阜新和通辽，让开大路，占领两

厢的游击战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46年秋的一个清晨，吕明仁率部队来到库伦街的一个村子里，正准备吃早饭，国民党东北行辕长官部特务团闻讯追来。吕明仁当机立断，指挥迅速撤至后山坡。敌人进村后，看到热乎乎、香喷喷的小米饭，高兴地大叫起来，于是，都把枪放下，开始狼吞虎咽的填肚子。吕明仁站在山坡上，拿望远镜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敌人全副美式装备，却没追上来，他断定敌人已是疲惫不堪，下令马上反击。他带队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人，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慌忙逃窜。吕明仁指挥追击，发现山沟里钻出敌人，他立刻叫警卫员通知骑兵连赶来，打了一个大胜仗。

吕明仁很善于做思想工作，他待人诚恳，谦虚和蔼。即像温和敦厚的兄长，又像诲人不倦的老师。他的秘书宋树功是刚从延安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初到阜新，不知怎样做好秘书工作，思想上有些负担。吕明仁看出了他的心事，亲切地鼓励和安慰他，并和蔼地说：“地委领导让你干啥就干啥，地委机关需要 you 干啥就干啥，在实干中学，在实干中增长才干！”听了吕明仁的话，宋树功心里踏实了，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吕明仁的警卫员周澍澄只有15岁，没有上过学。吕明仁一有空，就耐心地教他学文化。可周澍澄对学习热情不高，认为自己会打枪就行，吕明仁耐心地开导他：“你还小，不能总当警卫员，打完仗，消灭了敌人，要建设咱们的新国家，没有文化可不行。一定得学习。”在吕明仁的启迪帮助下，周澍澄的进步很快，成为革命的栋梁之才。（一百一十六）（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B 白城记忆

《礼记》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它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是研究先秦礼制的重要典籍。《礼记·檀弓下》讲了一个“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

有一年，齐国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许多百姓因缺少粮食而被活活饿死。有个名叫黔敖的富人，为了博得好名声，在大路旁摆上一些食物，等着饿肚子的穷人经过，施舍给他们。一个饿得不成样子的人用袖子遮着脸，拖着一双破鞋子，摇摇晃晃地走过，黔敖看到后，便左手拿起食物，右手端起汤，吆喝道：“喂！不要钱的食物啊！来吃吧！”那个饿汉抬起头轻蔑地瞪了他一眼，说：“我就是因为不吃这

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注重“材美”“工巧”“器雅”，古人对于器物的形状、质地、色彩的追求可谓孜孜不倦。一件器物，可以拙朴到浑然天成、不露斤斧，也可以繁复、精美到无以复加。“过去的生活，一切都很慢”，因此无论是天潢贵胄，还是黎民百姓，家里或许都会有几件称心如意的工艺品，点缀他们的“慢生活”，同时也供平日里观瞻、摩挲和品鉴。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那些与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温度的传统工艺家具与器物，除了留存在一些被保留下来的宫殿、宅第、古厝中，还在热衷传统工艺设计的美术家手中不断传承。

家具、器物、雅玩里蕴藏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工艺源远流长且不断革新的丰富技法，更反映出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虔诚态度。

在传统中式住宅中，堂屋是家庭起居和会客访友的重要场所，也是住宅中最“热闹”的地方。明末清初以降，堂屋内家具的摆放讲求沿中轴线对称排布，呈现出威严的秩序感和庄重感。条案、八仙桌、太师椅、屏风……家具款式或敦厚稳重、雕龙画凤，或简洁大方、明快素净。家具工艺设计师有时也会结合二者，在不同风格间寻找平衡点。利用素底浅浮雕、铜皮包角，或者是雕漆、镶嵌等手法，创作出落落大方的宝座、圈椅、平头案等，再于案桌上摆几组天球瓶、梅瓶，在立柱和墙面上悬挂数量不等的对联和字画，于一片重彩中现几抹亮色，美感与趣味油然而生。堂屋中的各种陈设，一般是经过精心挑选和安排的，它们集中反映出这个家庭的学养、观念、境遇以及处世态度等等。

相对于堂屋的井然有序，传统中式住宅里的书房则是另一番景致。它是书写、阅读、对弈、焚香、抚琴和品鉴文玩的安静场所，也是陶冶性情、修身养心的“幽谷”。传统书房是一个实用性 with 仪式感并重的文人自娱空间，现代书房同时还是办公室在家中的延伸。一些经典的文化用品如文房四宝，迄今为止仍然是书房中的重要物品，与其相关陈设的造型虽然简洁，但其选材备料却极其挑剔。传统书房用品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笔筒、竹雕、石刻、木制或者漆绘者比比皆是，因尺寸适宜，所以各种工艺技法都可以在上面获得施展的空间，从薄意到多层雕刻，从镂空到彩绘，应有尽有。图像与文字交织在一起，主题也千变万化，或梅兰竹菊，或历史典故，笔筒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文房雅器。文人书斋常设有博古架，收纳具有浓厚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的雅玩之物，如意、瑞兽、辟邪、香筒……这些器物或兼具一定的实用性，或纯粹只有赏玩之价值，但都承载着主人的精神寄托和美好愿望。试想，安静的午后，焚香习字，倦了便沏上一壶好茶，摆弄一下博古架上的心爱之物，或是从书架上取下一卷闲书捧读，岂非最惬意的享受。

卧房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在这样的空间，古人往往会选择精致考究的物件加以悉心布置，营造出最佳的休憩环境。卧室内摆放的家具有陈设性质的，也有收纳性

为善不求人知

●蒋光宇

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夹带，最难拔除者也。须是涤尽渣滓，斩绝萌芽，才见本来真体。”

行善举却想着要与别人攀比；帮助别人却想着借此传播名声；做事业只想着要令世俗震惊；保持行事的气节却想着处处与别人不同。这些都是藏在善念中的兵刃，长

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为善而欲自高胜人，施恩而欲要名结好，修业而欲惊世骇俗，植节而欲标异见奇，此皆是善

在传统工艺里寻味“慢生活”

●练春海



「森林之歌」刺绣



木雕转心瓶



「平安富贵」玉雕



“海屋添筹”金漆屏凤
雕嵌百宝嵌面条柜

传统生活方式的重要元素，为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与美的享受，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不妨在心里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中式宅院”，藏雅物于其中，为匆匆赶路的自己留一隅悠然的栖息之地。

成语里的中医

牛 溲 马 勃

●朱亚倩

牛溲马勃，比喻一般人认为无用的东西，在懂得其性能的人手里可成为有用的物品。也就是说，只要运用得宜，无用之物可以变为有用之材。在语义流转中，这个成语被拿来借指卑贱而有用之材，而且可以用于形容医生医术高。

该成语出自韩愈《进学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韩愈在任国子监祭酒时，经常给大学生讲课，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同时要求他们注意社会实践，要兼收并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都有它们的用途，不可随意丢弃，鼓励学生加强学习，灵活运用。

韩愈提到“医师之良”，点明了此成语具有医学内涵。“牛溲”和“马勃”指的是两种植物。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中说：“牛溲”原指“牛屎”，又是植物“车前草”的别名。车前草全草均可入药，具有利尿、消肿、清热、明目、祛痰的作用。

而“马勃”俗称药包子、马屁泡，是一种野生菌类食药两用植物，有很好的药用价值。梁代陶弘景《名医别录》载：“虽止治恶疮马疥，盖既能散毒，又能燥湿，以疗湿疮，固得其宜，故弘景亦谓数诸疮甚良。今人用以为金疮止血亦效。”马勃具有清肺利咽、解毒、止血等功效。

处处留心皆学问。一则成语中隐藏着两味中药，可谓新奇有趣。

了解古人心中——以学术为公

写书不署名到底图什么？

●熊建

匈牙利有位作曲家说：“人们不需要为了享受鹅肝而去了解鹅。”同样的道理，钱锺书说得更透彻。一位读者很喜欢钱锺书的作品，想要登门拜访他。钱锺书婉拒：“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大师很谦虚，但是不合情理，看书毕竟不同于吃饭。一位读者看了一本很喜欢的书后，很自然地就会想了解作者其人其事。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现代作者对署名权非常重视，对侵权行为非常痛恨，但中国古代的作者好像并不这么想，因为很多古书都不写作者的大名。

《周易》的作者是谁？司马迁说是周文王，现在看并非如此。《诗经》三百篇，作者是谁？根本考证不出来。《周礼》，相传是周公写的，这一点连汉代人都不相信。所以，善于读古书的人，得谨慎。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古书，都不题写作者。若有，那一般是后人想当然添加的。

战国时期的韩非，写文章把法家思想阐述得很深刻。有人把他的书传播到了秦国。秦王嬴政看到了，感叹道：“啊呀！寡人要是能和这书的作者见上一面聊聊，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写的啊，他是我同学。”

同样的一幕发生在汉代。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很来劲，说：“可惜朕不能和作者相识啊。”正好有个官员叫杨得意的在一旁侍奉，他听到后对汉武帝说：“作者是我老乡司马相如。”

秦始皇、汉武帝，看到了书，却不知道作者是谁，如果不是李斯和韩非同门、杨得意与司马相如同乡，连一国之主都无法知道作者高姓大名。所以，古人写书写文章，

真的不习惯、不倾向、不愿意自己署名。

有人可能纳闷了：不对吧，很多古书的作者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当成书名了啊，比如《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等等。

事实上，古书这么命名，为的是表明书中所言是出自哪里，彰显师门家法的。就像《论语》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一样，先秦子书一般都是某家后学记录、搜集祖师爷的文字、言论后编辑整理出来的。

还比如《晏子》，北宋官方出版的目录《崇文总目》里说了，这是后人采集晏子故事编写的，如果以为是要晏子自己写的就不对了。

为什么古人重视自己的著作权呢？有学者推断，古人以学术为公，写书不是为了争名，对社会有益就好了。作家木心把这种“只留作品，不留作者”的行为，称为“大自然的作风”。

那为啥汉代以后的作者就不那么“急公好义”而非要把自己的名字标明呢？因为汉代开始，做学问学得好，是可以当官的。所以，当时的官方学者，门下弟子很多，他的学问与大名不愁没人传。

而民间学者、私人著述，写的书不被国家认可为功名利禄之桥梁，就少有人跟着学。作者要是死了，他的学问可能就会失传，“尔曹身与名俱灭”了。不信您看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写出了《史记》，也不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待后来君子吗？于是，他们就想办法把自己推销出去。在书里题写自己的名字，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古书今读